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6 年第 10 期 · 总第 898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不一样的石油冲击：2026 年霍尔木兹危机对德国意味着什么

德国工业心脏的危机：2025 年金属与电气工业结构报告分析

德国气候评估报告：减排进度显著滞后

德国已成为第二次“中国冲击”的震中

军工企业莱茵金属的国防繁荣与现实考验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6 年 5 月 10 日—5 月 25 日）

不一样的石油冲击：2026 年霍尔木兹危机对德国意味着什么

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供应中断

2026 年 2 月 28 日，伊朗在美国和以色列对其发动空袭后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终结了约占全球石油出口 20% 的水路运输。国际能源署（IEA）评估认为，这是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

海湾产油国通过紧急管道转移了部分石油，但全球原油供应仍在 3 月份下降了约 10%。4 月 13 日，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进一步削减了全球 3% 的供应。两者叠加，13% 的供应缺口大幅超过了 1979 年伊朗革命期间约 7% 的中断。

到 4 月中旬，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 130 美元以上，较战前价格上涨 94%。成品油价格的涨幅更为剧烈。这一涨幅之所以没有更高，部分得益于三个因素：国际能源署史无前例地释放了 4 亿桶紧急储备、美国暂停对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 4 月 10 日以来维持的脆弱停火。即便如此，供应缺口在短期内仍将持续——即便在持续和平的情况下，生产和交付的滞后性也将继续制约海湾地区的出口。截至本文撰写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为何这次危机不同于 1973 年和 1979 年

在以往的石油危机中，价格要么翻了两番（1973 年），要么涨了一倍多（1979 年），为产油国带来了巨额暴利，包括禁运解除后的大多数海湾国家。许多海湾国家将这些收入用于投资和发展——这种“石油美元回流”将相当比例的石油利润重新导向西方资本货物工业。德国收益尤其巨大：其在金属、机械、设备和车辆领域的专业化与海湾国家对资本的需求高度契合。1974 年，西德在石油上花费了约 85 亿美元，但向产油国出口了价值 36 亿美元的货物。

2026 年的危机通过三重物理冲击打破了这一模式

第一重冲击：出口严重受限。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石油出口被大幅削减，伊朗的出口自 4 月 13 日起实际上已完全停止。

第二重冲击：储油设施接近或已达容量上限。这迫使产油国关停油井，而恢复生产则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第三重冲击：基础设施损坏。这将在中长期内对整个地区构成制约，卡塔尔预计其天然气设施的修复需要数年。

这三重冲击的结果是导致海湾产油国无法通过高价格获利，因其无法交付足够的产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获得的任何利润都可能被用于基础设施修复。海外投资收缩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海湾国家已启动对海外投资和未来财务承诺的审查，据报道，阿联酋已寻求美国的财政援助。

对德国的双重冲击

因此，当前的能源危机可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德国。

第一个是直接渠道，更高的能源价格抬高了工业和家庭的成本。这是所有石油进口国共同面临的冲击。

第二个渠道却截然不同，且对德国尤为不利。与以往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可能不会增加德国的出口。德国的历史性贸易顺差部分依赖于石油价格和产油国自身的经济稳定。2024 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资本货物的出口，德国对海湾国家的出口远超进口，实现了 183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虽然对海湾国家的出口仅占德国总出口的 1.5%，但对海湾国家的顺差却占德国 2500 亿美元总贸易顺差的 7.3%。

海湾地区能源相关基础设施的修复成本预计高达 580 亿美元，这可能会促使海湾国家采购额外外国设备，引入承包商和物流企业，德国有望从中受益。然而，海湾客户很可能会削减其他投资和开发项目。因此，石油美元回流渠道可能无法像 1970 年代那样吸收成本冲击，德国对海湾国家的顺差可能会缩小。

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场五年内的第二次能源危机，是否会改变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

一方面，化石燃料的固有风险使得加快能源转型在经济、韧性、国家安全和工业政策等多个领域都显得越来越理性。另一方面，2022—2023 年能源危机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也可能选择进一步投资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安全。在这种危机时刻，对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的担忧可能暂时优先于气候中和与环境考量。

这些变化对德国工业和可再生能源资本货物出口带来的影响，仍有待未来数据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德国正面临一场全新的能源危机——它不会带来石油美元的馈赠，只会推高成本并倒逼能源转型。

(编译自德国经济研究所 (IW) [2026 年第 34 期简报](#))

德国工业心脏的危机：2025 年金属与电气工业结构报告分析

一场被低估的国家危机

德国经济正深陷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最久的危机之中。2024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连续第二年下滑，经济产出仍停留在 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 (IW) 估算，截至 2024 年，价格调整后的 GDP 累计损失高达 7350 亿欧元；理论上，当前的德国经济本应比实际高出 8%。

进入 2025 年，情况并未好转。上半年数据显示，投资活动持续低迷，而 2026 年的增长预期已被下调至仅 0.5%，其中约一半的增长甚至要归功于异常多的节假日落在周末这一纯粹的日历效应。德国经济研究所直言，这已不仅是周期性下行，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本土危机”。

制造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创最为严重。2024 年，制造业实际总增加值较 2019 年下降 3.8%，2023 年疫情后的短暂复苏已完全消失。更严峻的是，制造业对总附加值的贡献降至 19.4%——除 2009 年金融危机外，这是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私人设备投资在 2025 年底再次崩溃，而公共服务业首次以 20.5% 的“附加值贡献”超过了工业本身。这一此消彼长的趋势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当国家支出不断扩张时，私人投资却在萎缩；当官僚机构日益庞大时，企业活力、投资意愿和创新动力正在被扼杀。

金属与电气工业：德国商业模式的支柱正在动摇

金属与电气工业（M+E）是德国制造业中最大的分支，也是所谓“德国商业模式”的核心。近 400 万人在这个行业工作，创造了德国约 14% 的总增加值。其人均生产率（114,300 欧元）和雇员收入（61,800 欧元）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投入约 9200 亿欧元，带动了上游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贡献了制造业 81% 的研发投入，占德国企业外部研发投入的 75%。

然而，正是这个支柱行业，正在经历最剧烈的震荡。2018—2024 年，金属与电气工业生产年均下降 2.3%；从 2023 年第一季度到 2024 年第四季度，生产指数下滑了整整 10 个点。就业方面，该行业自 2018 年以来年均缩减 0.3%，相较于 2019 年的峰值，到 2024 年已流失约 13.4 万个工作岗位。仅这些流失的岗位，就在 2024 年造成了约 150 亿欧元的 GDP 损失。而 2025 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裁员仍在继续。

双重夹击：成本陷阱与全球化退潮

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的困境源于两个相互交织的深层压力。

首先是本土竞争力的系统性溃败。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2025 年的区位排名中，德国位列第 19 位。而在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区位指数中，德国在作为比较的 45 国的成本水平上排名第 44 位（倒数第二），成本动态排名第 42 位（倒数第四）——这意味着德国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成本劣势还在进一步加剧。

分项来看，德国的成本压力尤为严峻。劳动力成本每小时接近 45 国平均值的两倍。即便考虑到德国较高的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仍仅低于少数国家。无子女雇员的工资附加费率已达 42.9%，且在持续上涨，若无改革将进一步攀升。企业所得税率约 30%，在 45 国中排名第 42 位。自 2020 年以来，生产者价格上涨了 33%，而美国上涨仅为 25%，中国甚至下降了 2%。电力成本在欧洲已属最高，天然气的价格设定功能和煤电碳成本推高了电价，2021—2022 年的能源价格对欧洲的冲击远超世界其他地区，而对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依赖可能使这一劣势长期化。德国利率处于低位，融资环境看似有利，但企业普遍反映银行信贷日益收紧，《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分类法等相关政策正在变成投资障碍。官僚成本虽难以在国际间精确量化，但已被企业视作日益严重的投资阻碍，与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相比显得尤为突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全球化动力的结构性减弱。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的出口比率高达 64%（2023 年），远高于中国（23%）和美国（29%），这意味着它对国际市场增长的依赖程度极高——尤其是欧洲市场，约五分之三的出口流向那里。然而，全球金属与电气工业贸易增长近年来明显放缓，2021—2024 年的年均增长率（2.2%）不到 2015—2021 年（4.8%）的一半。德国在全球金属与电气出口中的份额从 2015 年的 10.3% 降至 2024 年的 8.8%。对中国这一曾经的增长市场的出口明显疲软。

更具威胁性的是竞争格局的变化。关税和贸易壁垒冲击了德国出口商，而中国企业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保护了本土市场。在金属与电气工业的传统强项——中高科技产品，特别是汽车和机械制造领域——新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2023 年，中国的汽车出口

量跃居全球第一，其研发投入规模（2021—2022 年约 1970 亿美元）已是德国（590 亿美元）的三倍多。

从领先者到追赶者：创新优势的侵蚀

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长期以来以研发密集、创新能力强和生产效率高著称。超过 80% 的制造业研发投入来自该行业，其雇佣的研发人员占全国总量的 63%，27% 的销售额来自新产品（行业平均水平仅为 12%）。在国际比较中，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为 11%，虽高于许多国家，但已落后于美国（19%）、日本（14%）和韩国（15%）。

然而，真正的挑战来自规模效应。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虽为 9%，低于德国，但其巨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金属与电气行业研发投入总额达到约 1970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是德国的 3.3 倍。这种持续的创新投资使中国在许多技术密集型领域成为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

产品复杂度指标也发出了警示信号。2024 年，德国经济复杂度指数排名全球第 6，仍属领先，但在出口多样化指数中已跌至第 11 位，此前一直位居前十。在中高科技产品这一核心市场，德国未能跟上全球出口增长的步伐，市场份额下降约 2 个百分点，而中国同期增长了约 5 个百分点。

企业的呼声：减少官僚负担、降低成本、重获可规划性

面对危机，金属与电气企业对新联邦政府有着明确的优先诉求。一项调查显示，约 55% 的企业将“减少官僚负担”列为三大优先事项之首，约 48% 要求“放松管制”，约 46% 要求“降低工资附加成本”，约 40% 呼吁“企业税制改革”，约 37% 希望“降低能源成本”。相比之下，“促进投资活动”（18%）、“扩建数字基础设施”（15%）和“提高专业人才可得性”（13%）的优先级明显靠后。

企业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劳动力成本、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规划性、官僚负担和管制、能源成本、企业税负。这反映出企业的担忧不仅限于成本，更在于成本背后的制度环境——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难以规划的营商环境。

政策应对：已迈步，但远未够

新联邦政府的联盟协议和首批措施显示，政策制定者已认识到主要挑战。在能源领域，取消天然气储存附加费、永久降低工业电力税、联邦预算拨款 65 亿欧元承担部分附加费和电网费用，这些措施已开始缓解企业的能源成本压力。在企业税方面，议会通过了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法案，但降至 10% 的目标要到 2032 年才实现，完全取消团结附加税在本届立法期内已不可期，不过投资激励措施创造了额外减负。

然而，在最关键的劳动力成本领域，联盟协议缺乏应对社保费率（目前 42.3%~42.9%）进一步上涨风险的充分方案。将电价降低 5 欧分/千瓦时的目标虽具雄心，但工业电价的具体设计仍待明确。而关于精简规划和审批程序、全面数字化行政流程等国家现代化的承诺能否兑现，其效果仍有待观察。

报告强调，这些措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并加快落地。社会保障和工资附加成本方面的改革尤为不足。正如报告所言：“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政府必须重获企业信任，以实现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代际警示：繁荣的根基正在松动

这份报告的最终警示跳出了短期经济周期范畴。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只有通过更高的生产率来弥补，才能保障经济增长与繁荣。而创新工业正是应对脱碳、数字化等未来挑战的关键。德国依托知识密集型生产、复杂的工业生态系统、高质量的资本货物建立起来的早期优势不会长久不变，若不持续培育，这些优势将不可逆转地流失。

2025年的金属与电气结构报告描绘了一幅矛盾的图景：一方面，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仍拥有极高的生产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本土成本结构、官僚负担和政策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侵蚀这些优势。全球金属与电气市场仍在扩张，对高质量投资货物和解决方案的需求持续增长，但德国能否从中获益，关键在于创造一个让企业愿意投资、敢于创新、能够规划的制度环境。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提出缩小国家消费与私人投资的剪刀差，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但这需要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恢复本土竞争力，并在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中切实削减开支。报告的最终结论清晰而紧迫：除了增强本土竞争力（例如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恢复国防准备能力的措施，其他各项举措都必须重新评估。联邦政府现在必须全面转向供给侧政策，回归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否则，这场联邦德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危机，可能只是一个更长衰退期的开端。

（编译自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5月12日发布的[第12期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结构报告](#)）

德国气候评估报告：减排进度显著滞后

德国气候问题专家委员会近期发布了一份被舆论形容为给联邦政府“响亮耳光”的评估报告，严厉批评德国现行的减排措施远不足以实现法定的气候目标。报告指出，尽管《气候保护法》规定德国需在2030年前减排65%，但专家委员会认为政府对温室气体下降的预期过于乐观，预计到2030年德国的碳排放预算将超标6000万~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特别是在交通和建筑部门，现有的政策措施被证明完全无法弥补显著的目标偏离。而在未来数十年内，土地利用领域（LULUCF）不仅无法做到固碳，反而可能继续成为碳排放源。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批评联邦政府最新的《2026年气候保护计划》草案缺乏整体性的概念，仅是“想法的堆砌”，且在制定时参考了已经过时的2025年预测数据，导致计划在发布之初就已不符合当前的严峻形势。

这种担忧在科学界和社会团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伍珀塔尔研究所等机构支持委员会的观点，认为政府淡化《建筑能源法》和削弱可再生能源扩展条件的做法将严重拖累减排进程。气候保护公民游说团等组织则呼吁引入“气候津贴”（Klimageld）来补偿受影响的低收入家庭，以维持气候政策在社会层面的接受度。

在德国国内深陷政策争议的同时，国际气候科学研究也在拿骚同步开展，来自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工作组的 200 多名作者正在巴哈马商讨第七次评估报告的草案，旨在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气候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的最新科学评估。综合各方信源，专家委员会与科研机构达成了一致的科学结论：如果德国政府不立即加强政策执行力并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调整，到 2045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将变得极其渺茫。

（编译自德国 tagesschau.de 网站 [5月18日评论文章](#)和德国广播电视网站 [5月19日的评论文章](#)）

德国已成为第二次“中国冲击”的震中

中国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正在“可量化地”增加。英国知名智库“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简称 CER）在一份分析中指出，德国已成为“第二次中国冲击的震中”。

《商报》报道援引 CER 的分析报告并指出，中国企业凭借国家补贴和过剩产能，在汽车工业、机械制造、化工以及航空等德国核心支柱产业快速抢占市场份额。这种竞争压力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市场，还延伸至欧盟以外的第三方国家，甚至已直接渗透到欧洲本土市场。CER 认为，尽管这一冲击正在严重削弱德国关键产业的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但德国联邦政府迄今为止的反应仍显被动，未能采取足够有力的应对措施。

CER 智库早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政策报告《德国工业如何在第二次中国冲击中生存》中就已发出警告。该报告对比了两次中国冲击：第一次冲击主要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德国凭借高端出口相对受益；但第二次冲击则直击德国最具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导致德国工业生产连续多年下滑，市场份额大幅流失。该智库警告，德国若继续保持自满和被动态度，将面临严重的去工业化风险。

《商报》在报道中强调，尽管中国仍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德国应积极支持欧盟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报道同时提到，欧洲议会最近已通过更严格的钢铁行业保护规则，以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低价竞争。此举被视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整体应对力度仍显不足。

该报道反映出在当前德国产业界和政策辩论中，对华经济关系趋于务实和谨慎的转变。在默茨政府执政背景下，如何在维护中德经贸关系与保护本土工业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正成为德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编译自德国《商报》网站 [5月20日文章](#)）

军工企业莱茵金属的国防繁荣与现实考验

莱茵金属（Rheinmetall）作为德国最大军工企业，在过去几年中从联邦国防军手中获得了大量数十亿欧元订单，已成为德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工业支柱。然而，该公司正面临将这些巨额订单有效转化为实际营收和交付能力的显著挑战。

报道称，莱茵金属与几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自 2022 年德国宣布“时代转折”以来，公司凭借与国防部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社民党）的密切合作，深度参与联邦国防军几乎所有关键现代化领域，包括弹药生产、车辆与火炮系统、无人机和巡飞弹、士兵数字化装备（IdZ-ES）、卫星通信以及军事软件等领域。公司 CEO 阿尔明·帕佩格尔（Armin Papperger）雄心勃勃地提出目标，计划依托德国国防预算的持续增长，到 2030 年将营业额提升至 500 亿欧元左右。

尽管订单充足，但最新季度运营压力已经显现：2026 年第一季度营收约 19 亿欧元，低于预期的 23 亿欧元，公司股价今年以来也累计下跌超过 20%。《商报》分析认为，莱茵金属在产能扩张、供应链管理以及同时开拓卫星和海军新业务等方面面临复杂挑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巨额框架合同难以如期转化为稳定收入。

《商报》还指出，莱茵金属在当前安全环境下对联邦国防军至关重要，没有它的产能扩张和系统集成能力，德国的弹药储备重建和军队现代化几乎难以推进。但这种高度依赖单一企业的局面存在战略风险，德国需进一步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合作与供应商多元化，以确保长期供应安全。

（编译自《商报》网站 [5月11日报道](#)）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6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

5 月 10 日 德国选择党在地方层面再次取得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位于柏林以北、勃兰登堡州上哈弗尔县的采登尼克市（Zehdenick）近日举行市长补选，选择党候选人热内·施塔特凯维茨（René Stadtkewitz）以 58.4% 的得票率胜出，成为该党在勃兰登堡州首位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专职市长。

5 月 11 日 巴符州绿党和基民盟在新一届州议会中各获得 56 个议席，并最终决定继续联合执政。两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就未来五年的施政计划达成一致。根据协议，巴符州的儿童在进入小学前一年的幼儿园教育将免费，并实行强制入园制度。

5 月 13 日 德国绿党政治人物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正式成为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新一任州长。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州议会投票中，这位拥有土耳其移民背景的政治家于第一轮表决便顺利当选，也成为德国联邦共和国历史上首位拥有土耳其血统的州长。

5 月 14 日 德国总理默茨在亚琛向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颁发查理曼奖，以表彰其在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稳定欧元的关键作用。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个人成就的认可，更是对欧洲货币联盟结构性完整的肯定。默茨特别提及了德拉吉在 2012 年欧债危机最严重之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以及其 2024 年发布的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精准地提出欧洲当前必须提升竞争力，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5 月 17 日 德国总理默茨因计划推行社会福利改革而面临日益激烈的批评。服务行业工会（Verdi）批评联邦政府至今未与工会开展共识性对话，要求以平等地位参与政治讨论。默茨正承受来自工会和经济界的双重压力。

5 月 18 日 德国内政部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宣布，联邦政府计划在 2029 年前投入 100 亿欧元，用于加强德国民防能力。资金来源于此前通过的债务刹车改革，该改革允许国防和民防支出超出 GDP 的 1%。受国际局势影响，德国政府开始重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运转能力。

- 基民盟目前面临严重的政治压力：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已跌至德国选择党之后。在柏林举行的数字会议上，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受到热烈欢迎，也让不少人追忆起政治局势更为稳定的时代。

5月19日 德国联邦政府着手逐步将2022年国有化的能源集团Uniper重新私有化，优先考虑能维持集团整体性的长期投资者。根据当初欧盟国有化要求，政府持股最迟于2028年底须降至25%以下。

5月20日 德国联邦政府决定入股德法防务集团KNDS，计划在该公司今夏上市前购入40%股份，并于未来2—3年内减持至30%。法国也打算同步减持股份。集团欢迎国家入股，但强调长期目标是将国有股份降至50%以下。公司各项决策将通过具体协议而非多数股权来保障。KNDS是“豹2”主战坦克和“拳师犬”轮式装甲车等武器系统的生产商。

5月21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德国GDP环比增长0.3%，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环比强劲反弹3.3%，而同期进口额仅微增0.1%。在各项内需指标中，政府消费支出环比增长1.1%，但家庭消费支出表现疲软。受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影响，德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124亿欧元，较2025年同期的178亿欧元大幅下降30.5%。

- 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全面改革德国驾照获取制度，以降低平均3400欧元的高昂费用，并简化获取流程。新规预计于2027年1月1日生效。改革内容包括取消强制到校课程，允许数字化教学；理论考试题库削减三分之一但保留安全类问题；减少特殊驾驶课时数；允许学员在经验丰富的陪同人员指导下练习驾驶。

5月23日 2024年德国入籍人数达到约29.2万，创200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比增长46%。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数据尚待统计完成，2025年已有超过30.9万人入籍，再创新高。叙利亚和土耳其籍入籍者占比最高。

5月25日 咨询机构安永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外国投资者在德新项目共计548个，较上年减少约10%，连续第八年下滑，创下2009年以来新低。德国在高税负、高能源成本重压下竞争力的持续衰退。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6年5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